

## 評岡田英弘的《現代中國與日本》

● 楊際開



岡田英弘：《現代中國と日本》（東京：新書館，1998）。

1998年日本東京新書館出版了岡田英弘的《現代中國與日本》，書中八篇論文多寫於1979-80年，編成「中國人的日本觀」與「日本化了的中國人群像」兩部分。著者在〈後記〉中指出，該書說明了日本是如何影響着現代中國的歷史的。這正是貫穿全書的論點。

〈序論〉是著者1980年底訪華時的印象記。他從「日本在更深的層面上，改變了中國史的類型」的論述出發，回顧了日中關係史，並指出近代國家的浪潮開始席捲中國是以新疆、台灣的置省為標記的，而甲午戰爭則終止了中國文明的歷史，並開啟了與日本文明互動的中國歷史。

在這以前，我們習慣從天朝體制與近代國家的衝突或帝國主義擴張與民族運動這一圖式來理解甲午戰爭，但岡田卻從文化接觸的角度，強調近代日本對中國史類型轉變所起的作用。由於看問題的視角變了，岡田對同樣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是極自然的。

論者往往把中日兩國的近代化過程作比較，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比如談同治中興，就與明治維新比較，結果同治中興以洋務運動失敗告終，而明治維新則催生了東亞第一個近代國家。學人多以近代國家為思考的原點，注重中日兩國以「民族國家」為價值基準，煽動民族主義感情，尋找共同的國民感情根源，而忽視了兩者在迎接西方挑戰時相互救援、互為補充的

1998年日本東京新書館出版了岡田英弘的《現代中國與日本》，書中八篇論文編成「中國人的日本觀」與「日本化了的中國人群像」兩部分。著者在〈後記〉中指出，該書說明了日本是如何影響着現代中國的歷史的。

對明治日本的社會景象耳濡目染、深感驚訝的，是中國首屆派往日本的使臣及其隨員。他們長時間在日本社會生活，體驗了與自己有內在關聯的傳統文化的近代復興。後來，他們通過在國內的活動把在日本獲得的近代國家觀念傳播給國人。

現實關係。岡田的基本觀點雖然仍未脫盡近代民族國家神話的影響，但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的新思路。

在中國，對明治日本的社會景象耳濡目染、深感驚訝的是中國首屆派往日本的使臣及其隨員。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敘》中感歎：「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事，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這是一個契機——通過相同的文字媒介開始轉換國家觀念，這一過程後來主要是靠留日學生來完成的。他們長時間在日本社會生活，體驗了與自己有內在關聯的傳統文化的近代復興。後來，他們通過在國內的活動把在日本獲得的近代國家觀念傳播給國人。

與黃遵憲同時赴日的，還有一位浙江寧波籍的副公使張斯桂。他將在日本的見聞化成文字，發表在1895年出版的《小方壺齋叢書》第四集上，題為《使東詩錄》。張在參觀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寫道：「韜略自西忽自東，特開戎幕教從戎。將軍他日來天上，能師從今在禁中。」張早年出入於曾國藩幕府，對太平天國帶來的文化危機有切身體驗。他是惠頓(Henry Wheaton)《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漢譯本序的作者，在當時是精通東西國際問題的專家。「韜略自西忽自東」是張斯桂站在東西國際關係轉變的視野發出的感受，湘軍由於不能與清帝國自我認同而解散。在中國，從地方團練向地方新軍的過渡，又從地方新軍向國民軍的轉變過程中，日本不僅是人才輸送、培

訓的基地，也是中國近代國民思想的發源地。

岡田為了證明他提出的命題，選擇了魯迅、戴季陶、蔣介石等對中國現代史產生過影響的原留日學生進行研究。著者通過使用兩種語言思考、生活的國際人命運的視角來分析魯迅的內在生活。他認為，明治時代的留洋學生，根據英語、法語、德語的文法結構及語言改造了當時的日語。中國留日學生也用同樣的方法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化的基礎，其中根本的影響是日語帶給現代漢語的。這是因為新造的日語大量使用漢字，而中國留日學生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現代漢語。

中國留日學生認同日本國民的情緒亦影響着他們對日本政治權威的認同，秋瑾在日俄戰爭前夕就寫過「明治天皇雄威武姿」的詩句。從清帝與明治天皇的形象置換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政治意識的變化。早期的留日學生章宗祥有過這樣的回憶：「最奇者，日本為萬世一系之君主國，而學生在東者轉習得革命之思想。」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日本的天皇制與中國革命思想有內在的關連。

日本國民情緒的涵養是通過溫存傳統的形式達到的。天皇制、漢字、假名、舊式的衣、食、住都引起了來自南方中國留日學生的歷史懷舊感。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天子」是道德假想秩序的中心點，而社會秩序就建立在這一假想上。留日學生參與了日本的國民生活，接觸到國民的道德觀念，很自然地就把出現在他們視圈內的天皇形象與其觀念中的「天子」結合起來。當他們

心中出現與皇權對抗的另一個政治權威時，同一文明圈內就出現了兩種秩序觀的對決。這一過程是通過植根於他們文化中的普遍王權的形象置換達到的。由臣民向國民、由帝國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是建立在中國史內的連續性上的。

出生於溫州的宋恕是最早從文化轉換的角度研究日本的中國人。他不像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那樣只限於對日本作客觀的介紹，而是將清學的研究方法應用於研究日本文化，把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與近代日本的崛起這兩個課題結合起來考察，從批判傳統中國與再建近代中國兩個方面指明了傳統中國現代轉型的方向。直接受他的日本觀影響，並在近代史上留下重大足迹的同時代人可以舉出譚嗣同、梁啟超、章炳麟。

岡田也指出，同化型的留學生都發生性意識的變化。性意識的變化意味着生活態度的轉變。張競以秋瑾為例，提出了革命思想與新的戀愛觀相關的課題。中國的戀愛方式與家庭生活也因此走向了近代的價值規範。就這方面而言，日本仍然是新一代中國人價值取向的源泉。

性情可以理解為一種審美觀念、生活態度，帶着整個文明的烙印。戴季陶曾說過：「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會組織的制度。但是在社會組織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動社會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種變化，生一種的改革。」這指的就是性情的變化。留日學生多少都發生了這樣的性情轉變，形成了必需實行習俗與社會改革的共同觀念。

孫文在1924年訪日期間曾說過：「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這是從政治革命的角度敘述近代中國的形成與日本的關聯。周作人把《源氏物語》視作唐朝的《紅樓夢》，認為日本是構成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以近代國家觀念為基準，《源氏物語》記錄的是日本文學中的戀情故事；而從唐文化演變的角度看，《源氏物語》記錄的則是中國文明的一種生活樣態。這是從性情革命的角度擴大了中國人對「文化中國」的認識。

石川九楊在其《二重語言國家·日本》一書中提出了與政治、文化相符的真正意義上的日語歷史還不滿一千年的看法，他認為日語是在吸納漢語的過程中形成的。但岡田則認為，日語是偶然使用大量漢字構成的，所以對現代漢語的形成起了作用。他提出一個研究中國的新視角——從文化接觸的觀點重構近現代中日關係的話語。這種觀點如同他的「日本文明觀」一樣，出於同民族、同語言的近代國家觀。岡田處於東方學者身份與東方主義的狹縫之間，難免有加擔東方主義之嫌。

日本國學與儒學「古學派」的興起，可以看作是「文化中國」的學術邏輯對西學東漸的世界趨勢的回應。在這過程中，日本知識界逐漸完成了他們獨自的「東方主義」——在體制上變為西方的一員、在觀念上製造了蔑視中國的話語，但審視這一歷史過程，或許有助於我們發現走向未來的線索。

宋恕是最早從文化轉換的角度研究日本的中國人。他不像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那樣只限於對日本作客觀的介紹，而是將清學的研究方法應用於研究日本文化，把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與近代日本的崛起這兩個課題結合起來考察，從批判傳統中國與再建近代中國兩個方面指明了現代轉型的方向。